

爾愛其廠，我愛其人

管中閔

（原載 2005 年 8 月 25 日中國時報，「名家專論」專欄）

一九九零年代初，還籠罩在「六四天安門事件」陰影下的中國大陸開始努力發展經濟，全力對外招商，也開啓了台灣商人赴大陸投資的新頁。十多年來，不論政府政策為何，赴大陸的台商一直絡繹於途，而投資的熱潮始終未曾稍歇。

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，至今年四月爲止，台商對大陸投資累積已近四百三十億美元，中國大陸商務部的統計亦相當接近。這些投資占我國對外總投資的一半，而金額換算台幣超過一兆兩千億，約爲我國一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九分之一。若再加上透過其他管道的投資，我國對大陸的投資必然更加可觀。

在這股西進的熱潮下，政府政策也由早期具有禁止性的「戒急用忍」，轉變成近年的「積極開放，有效管理」。後者的「開放」，是回應企業界的要求，而所謂的「管理」其實是限制，也是在不得不開放之下的防守性策略。政府認爲對台商投資的項目加以限制，可以避免台灣關鍵產業的優勢流失，也能平抑經濟向大陸傾斜的趨勢。

然而「開放」與「限制」本是先天矛盾的方向，所以執行起來難免左右爲難。以十二吋晶圓廠爲例，企業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以及大陸市場的吸引，強烈要求開放投資；政府卻憂心此舉將使大陸在相關技術上得以發展，繼而威脅台灣產業，因此遲遲不願鬆手。

當政府與企業間還在爭論什麼「廠」可以開放投資，我們卻對台商西進中所流失的「人」感到分外惋惜。這些被歸類爲台商的人包括大小企業家，經營與管理幹部，以及各種工程技術人員。許多報導中估計，僅上海到蘇州崑山一帶，台商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人；若再加上各地的台商以及台商眷屬，人數更是不知凡

幾。有些台商由於不耐長年兩地奔波，於是將家眷接去，逐漸落地生根。

如果多數台商具有大學學歷，而培養一位大學生政府平均花費約八十萬元，五十萬台商就是約四千億的教育投資；如果再加上義務與高中教育，其數更不止此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人還代表著許多難以估算的專業知識，實務經驗，以及各行業的特殊 know-how。所以我們過去十多年所實際流失的，必然倍於那一兆兩千億的直接投資。

這麼看來，似乎更多的限制才是避免資金與人才繼續流失的對策。其實不然。當國際資金可以自由流動，目前對台商投資的限制只有象徵意義，而不會有實質效果，因為它無法阻擋迂迴前進的台灣投資者，也無法阻止當地企業在其他國際合作下的興起。同樣的，人的移動也無法限制。當企業依循經濟力量的指引而移動，作為生產要素的人也勢必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地方。

在目前西進的大趨勢下，除了繼續自身經濟體質的調整外，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開放。因為開放，專業人士得以自由出入於兩岸經濟活動，而不必被迫在兩地之間作選擇。當我們對中芯半導體開罰，我們就永遠失去了這批人。當台商選擇在對岸安家落戶，我們也永遠失去了這批人。有些失去的已無法改變，而我們應該避免失去更多。

前不久桃園停水之際，我們才複習了「臨渴掘井」這個成語，而現在或許是重新認識另外兩句：「歧路亡羊」與「亡羊補牢」的時候了。